

## 烏爾里希·茨溫利與蘇黎世宗教改革（1519–1531年）——概述與總結

*Dr Alexander Ressos, TEP*

*Attorney-at-Law (Switzerland), Solicitor (Hong Kong),*

*Solicitor (England & Wales)*

1519年1月1日，在他三十五歲生日那天，一位來自託根堡的神父登上了大明斯特教堂的講壇，宣佈他將從頭至尾、逐章講解《馬太福音》，以取代禮儀年中固定的經文誦讀。幾周之前，即1518年12月11日，Huldrych Zwingli 剛剛被選為這座教團教堂的民眾司鐸。<sup>1</sup>十二年後，即1531年10月11日，他倒斃在卡佩爾阿爾比斯（Kappel am Albis）的戰場上，獲勝的天主教軍隊將他的遺體作為異端分子焚燒。在這兩個日期之間，蘇黎世城改變了它的宗教、婚姻法、學校、濟貧制度、外交政策，以及其領土內大部分土地和地租的所有權。它是通過本市議會自己的決定做到這一點的——這些決定在議會廳中作出，並由議會的官員執行。蘇黎世宗教改革是一個具有歐洲意義的神學事件。而在其日常運作中，它首先是一項市政治理工程。

本章追溯這一工程，從 Zwingli 到來直至他去世以及隨後的和平解決。本章提出律師或銀行家在面對政權更迭時會提出的問題：由誰決定，依據何種權力，經由何種程序，對財產、收入和貿易產生何種後果？這些問題的答案在形式上驚人地具有現代性。蘇黎世議會將真正教義的問題視為一個它作為城市合法當局、在公開辯論中聽取論證之後有權作出決定的問題。它通過協商移交和行

## 烏爾里希茨溫利與蘇黎世宗教改革（1519–1531 年）——概述與總結

政法令接管了宗教機構的資產，將其置於一套會計機構體系之下，並將其收入用於由它自己界定的目的。它拒絕了當時任何聯邦州所能獲得的最有利可圖的合同——1521 年的法國同盟，並禁止其市民接受外國年俸。它使印刷機成為公共辯論的工具，並且幾乎是順帶地，讓德語歐洲最多產的出版社之一在這座城市成長起來。

雖然此後兩個半世紀蘇黎世都沒有銀行，但這一時期對於今天的金融中心仍然重要，因為宗教改革在該市的政治文化中確立了一系列傾向。蘇黎世學會了將議會視為公共道德和公共資金共同守護者，並對用來收買政治影響力的外國資金心存警惕。這座城市還建立了一套以世俗化捐贈基金供資的公共教育和濟貧體系，並將印刷文字發展成為一個產業。這些習慣構成了後來幾個世紀的商人、絲綢製造商以及最終銀行家開展經營的環境框架。關於濟貧的詳細規定，即 1525 年的《濟貧條例》（Almosenordnung），以及 Zwingli 和 Bullinger 關於利息和財富的教導，此處僅作概述，因為它們分別是第 B.II 章和第 B.III 章的主題。與加爾文治下日內瓦的比較則留待第 B.IV 章。

### 1 註釋

1. Thomas Konrad Kuhn, “Zwingli, Huldrych”, Neue Deutsche Biographie 28 (2024), <https://www.deutsche-biographie.de/sfz26927.html>, 該文給出的選舉日期為 1518 年 12 月 11 日，就職日期為 1519 年 1 月 1 日。關於 Zwingli 出生日期定為 1484 年 1 月 1 日，參見 Historisches Lexikon der Schweiz (HLS), “Zwingli, Huldrych” (Christian Moser), <https://hls-dhs-dss.ch/de/articles/010447/2014-03-04/>。

## 2 結論

1519 年至 1531 年間的蘇黎世宗教改革是一項由市議會在一位天才佈道者協助下實施的市政工程。Zwingli 提供了神學、修辭以及綱領的大部分內容，而議會則提供了將綱領轉化為秩序的程序、決定和行政機構。1523 年的辯論確立了議會作為教義裁判者的地位。1524 年和 1525 年宗教機構的解散——始於 Katharina von Zimmern 經協商移交聖母大教堂——將領土內很大一部分生產性收入轉移給了公共機構，後者將其用於教會、濟貧、學校、償債和領土收購。拒絕法國同盟和禁止年俸切斷了其他各州所依賴的一項收入來源，迫使蘇黎世依靠自身資源生存。印刷業發展成為一個產業。

這項工程的侷限在同一時期也顯現出來。議會不容忍其權威之外的異議，並處死了再洗禮派信徒。由於不願放棄其新財富所依賴的什一稅和地租，它令那些將福音書解讀為擺脫賦稅的解放憲章的農民大失所望。它的外交政策上過度擴張，並在卡佩爾輸掉了戰爭，失去了它的首席佈道者，也失去了建立一個改革宗聯邦的希望。《第二次卡佩爾和約》將宗教改革限制在已經採納它的各州之內，而《卡佩爾書》（Kappelerbrief）則將佈道者限制在講壇之上。

1531 年之後留下的是一個改革宗城市國家。它擁有一個處於市政控制之下的教會、一個因世俗化財產而擴大和充實的公共行政、一套由捐贈基金供資的教育和濟貧體系、一種市民紀律文化、一個印刷產業，以及對政治中外國資金的持久不信任。Bullinger 時代的蘇黎世、洛迦諾難民和絲綢製造商的蘇黎世，以及最終商人銀行家的蘇黎世，都是在這些基礎之上建立起來的。

## 烏爾里希茨溫利與蘇黎世宗教改革（1519–1531 年）——概述與總結

### 3 五句話概要

1. Zwingli 曾在馬里尼亞諾擔任隨軍牧師並領取教皇年俸，他於 1519 年 1 月 1 日來到大明斯特教堂後，將其佈道矛頭指向教會傳統以及僱傭兵和年俸制度，而蘇黎世議會將這一綱領化為己有。
2. 議會在 1523 年 1 月和 10 月的辯論中親自裁決宗教問題，接管了主教的權力，並設立了婚姻法庭、宗教會議和“先知學院”（Prophezei）等市政機構，以治理教會、紀律和教育。
3. 各宗教機構——始於 1524 年 12 月由 Katharina von Zimmern 移交的聖母大教堂——被解散，其財產被置於公共機構之下，這些機構的收入用於支付教會、濟貧、學校、償債和購買領地的費用，而教會的銀器則被熔鑄成錢幣。
4. 蘇黎世拒絕了 1521 年的法國同盟，禁止外國年俸，並直到 1614 年一直置身於該同盟之外；與此同時，曾於 1522 年舉辦“香腸晚餐”的 Christoph Froschauer 印刷所發展成為一家影響遍及歐洲的出版社。
5. 1531 年卡佩爾之敗（Zwingli 在此役中陣亡）為蘇黎世的雄心設定了界限，但市政對教會的控制、公共紀律、由捐贈資助的教育、印刷業以及對外國資金的警惕，仍然是後來金融中心得以成長的環境中的持久要素。

---

僅供一般參考。本文不構成法律或稅務意見，不能取代針對個別情況的專業意見，亦不建立律師與客戶關係。本文反映截至 2026 年 9 月的法律狀況。

網 上 版 本 : [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uldrych-zwingli-and-the-zurich-reformation-15191531-overview-and-summary](https://hk.helveticaregister.com/zurich-huldrych-zwingli-and-the-zurich-reformation-15191531-overview-and-summary)